

“70后”作家的都市想象

□翟文铎

在很多人眼里,“70后”作家是天然的都市作家。从数量上看,“70后”作家以都市为背景的作品确实不少,但是要想通过这些作品复原完整的当代都市形象,又颇觉茫然,原因何在?在我看来,最致命的缺陷在于大部分作品拥挤在青年男女的狭窄领域里舒展不开。尽管瞄准都市男女,但这代作家对爱情普遍缺乏信任,因此除了魏微的《拐弯的夏天》等个别作品,很少有人能通过情感开掘出人性的丰富性。缺乏真实的生命体验,丧失形而上追求,格调偏于低下,因此素然寡味;不仅如此,这样狭窄的表现空间阻碍了作家把视野投向无限丰富的都市生活,因此难以传达出深广的当代都市经验。在部分女作家的长篇小说中,这种症结表现最为突出。当然,这并不是一个突发的文学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最近20年“私人化”叙事片面膨胀、社会视野不断萎缩导致的必然结果。今天,当温子《子夜》的时候,如果不过分拘泥于它阶级分析的眼光,我们就不能不生出感慨:那俯瞰整个社会的阔大视野,那交响乐般的恢弘气势,确实有令人震撼之处;相较之下,那些在鸡鸣狗盗式两性关系中做道场的作品,气场又是何其孱弱!

文学创作注定是一项带有悲剧性的事业,平庸作品永远都是大多数,能在文学史上留下些许星光的只有个别精英。当代都市作品量多质差的情况呈现的也许就是文学的常态,令人欣慰的是毕竟有零星的“70后”作品传达出了崭新的当代都市经验。

流动性。有人把流动性看成现代社会最显著的标志,而都市生活最能体现这一点。现代都市如同一幅镶嵌画,被分割成不

同的功能区域和不同的社会团体,因此部分人难免要通过移居、流动和职业变动,跨越区域和团体之间的界限。《啊,北京》《三人行》《跑步穿过中关村》(徐则臣)、《逍遥游》(李师江)等写“京漂”的作品,就描摹了部分都市人“游牧式”的崭新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对于部分人而言是被迫的,但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是主动的追求。流动意味着打破固定的生活模式,意味着不断更新生命体验。芝加哥学派研究表明,部分流动工人具有主动追求变化、运动、危险、不稳定的倾向。《啊,北京》中的边红旗、《逍遥游》中的“我”,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对“漂泊”生活的向往。他们体验新感觉带来的刺激,接受新环境的挑战,感受外邦人特有的自由,甚至消受背弃伦理道德、社会责任之后的狂欢。流动性被看成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漂”的生活状态体现了现代都市生活最为本质的一面。

进退失据的困惑。都市书写的核心不在于如何描摹出都市景观,而在于如何表现出都市精神、都市意识。应该说“70后”作家的个别作品已经逼近了都市精神的内核,魏微的创作堪称典范。她的作品最擅长书写当代都市青年在自由与失重之间进退失据的困惑。《父亲的来访》中的小玉大学毕业后定居南京,在新的环境中她获得了放纵身体的自由,但父亲将来探望的消息又让她倍感压抑。在这里,父亲显然隐喻了传统伦理秩序,这个作品是借父辈与子辈之间的矛盾,表现城市化过程中新旧价值观念之间的剧烈冲突。对于魏微而言,创作这样的作品绝非偶然,她的《情感一种》《异

乡》也都表现了类似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棉棉的《糖》看成是魏微这一思索的延伸:“我”和赛宁已经挣脱了传统道德的约束,但随之而来的性欲、毒品、酒精和音乐相交织的感性化生活,赋予他们的远不是自由,而是带有自毁性质的颓废和虚无。循此思路,魏微清醒地意识到价值的丧失必然伴随着生命的失重,都市人要摆脱这一精神宿命面临着如何重新确立价值尺度的问题。《寻父记》写的就是灵魂上的“寻父”之旅。传统与现代、自由与失控、价值迷失与价值寻找,诸多矛盾标示出当代都市人所遭遇的精神困境。

孤独感。都市是拥挤的、喧嚣的,但在本质上却是孤独的——孤独感也是“70后”作家乐于表现的主题。戴来的一系列作品表现了被生活压扁了的人的“自闭症”,鲁敏的《细细的红线》描述了人群中的孤独者自我拯救的努力,而《铁血信鸽》写出了生命野性在丰富的物质生活中消泯的无奈,魏微的《薛家巷》《到远方去》暴露了人们在日常生活囚禁中的虚空。兰州作家弋舟则以长篇小说《跛足之年》集中展示了当代人灵魂深处的无聊感。主人公马领不能适应“单位”的僵化生活,带着捍卫自我价值的豪情愤然辞职,投身市场,却发现个性、尊严在交换原则面前孱弱不堪,于是逐渐沦落为“多余人”,陷入极度的无聊中。他试图通过虚构故事,干预他人生活、不断“越界”等行为,把自己从无聊中打捞出来,但均以失败告终,最后变成了行尸走肉。挪威哲学家拉斯·史文德森在《无聊的哲学》一书中写道:“在一个社会或文化中,如果无聊感增加,就表示意义的载体出了严重的问题。

意义必须作为整体来理解,我们在一个总体意义下参与社会,无论它采取何种形式,这个总体意义为琐碎的日常生活赋予了价值,它的另一传统名称就是‘文化’。许多现代理论家都得出了如下结论:文化已经消失了,并且被诸如‘文明’所取代了。如果无聊感增加,可能是因为总体意义消失。”在此意义上,弋舟对无聊感的开掘是深刻的,这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当代人灵魂深处的残缺和痼疾。《跛足之年》是近年长篇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但未能引起批评家和读者的高度重视,至今还处于湮没状态。

2003年,魏微和朱文颖在《作家》杂志上做过一次对话,认为当时中国“真正的城市生活的摹写尚未成形”,这话听起来有些绝对化,但事实一点也不夸张。中国都市文学的创作向来薄弱。而今10年又过去了,这10年正是中国都市化最为迅猛的时期,但检点起都市文学的整体状况,似乎依然不容乐观。在此大环境之下审视“70后”作家的都市文学创作,我们大致可以用喜忧参半来概括:一方面是大量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表现平庸,陷入多角性爱的泥潭无力自拔;另一方面又有少量作品捕捉到了当代都市精神的吉光片羽,在某个侧面上把握住了时代精神的实质。当下文化多元并存,社会现象纷繁芜杂,它的内核比任何时代都更加隐蔽,更加难以把握。魏微、李修文等作家都曾表露出难以穿透时代本质的困惑。在此情形下,尽管在整体上“70后”作家的都市文学还有不成阵,但能产生少量逼近时代精神本相的作品,已属难能可贵了。

■看小说

吴刘维《我岳父就这样老了》

《我岳父就这样老了》(《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3年第3期)营造的温馨家庭氛围和朴素而纯净的生活气场让人感同身受,显得特别真实。岳父史明清的勤俭叫人叫绝,俭省到可以为一元钱车票而绞尽脑汁纠结半天,但他对生活非常珍惜。他和妻子张德英在风风雨雨的30年里,最为奢侈的愿望就是想有朝一日夫妻双双游览一次庐山。年轻时没有时间没有钱,眼看退休了一下子又舍不得花钱了。渐渐老去岳父终于有一天摔倒住院了,大家才感觉到此刻的岳父、岳母算真的老了。老得不经不意,老得猝不及防。平实而琐碎的生活里,宣泄着那样一种亲情弥漫、爱意浓浓的气息,这份感动让我从朴素而纯净的生活场景中享受到艺术的熏陶。

徐永《没有你我的生活是什么样》

在《没有你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黄河文学》2013年第1期)中,“现实”和“幻想”一次次交会,“现在时”和“过去时”纠结缠绕、难解难分。

“我”在永和豆浆店邂逅一对男女,女人穿着“艾格牌”的白色羽绒服,眨眼间两个人又离开了。“我”在恍惚中尾随他们而去,却一无所获。第二天,“我”再次来到大街上,记忆中和“她”的一段对话浮上脑海,“后背上感觉到那张温润的脸”。夜晚,“我”辗转难眠,便心血来潮地替朋友去开出租车,碰到了各种“迷离、虚幻”的人和事……最后,谜底揭开:大前年的冬天,“她”穿着“艾格牌”白色羽绒服,“是我们在保龙仓买的……她伏在我的耳边说‘没有你,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穿“艾格牌羽绒服”的女人究竟是不是记忆中的“她”?“她”的离去是背叛、是意外、还是有着其他难以解释的理由?小说最终没有给出答案,一如无解的生活本身。在这个貌似单纯的故事里,作者以限知视角的第一人称,从最习见的日常生活出发,抵达了一种穿透和辐射;在他冷峻、甚而冷漠的笔调之下,展现出的是一个充满温情和伤感的心灵世界;生活中那些普通的人们,经历着各种琐碎的事物,在他们看似平静的外表之下,内心里时刻潜流涌动,充满着难以言说的迷惑和困顿。

本报讯 目前,农民书画作者已经形成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创作队伍。他们的作品正在一步步走向乡间农家迈向艺术殿堂,并成为展示地方风土人情的文化名片。3月25日至26日,中国农民书画研究会在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推举徐静为名誉会长,选举王林旭为会长,毕铭鑫为常务副会长,宗锡侯为副会长兼秘书长,白宏发、齐友昌、韩继海、董振礼为副会长。

与会代表表示要坚持“永远不要忘记农民,要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的宗旨,为推进新农村文化建设、开创农民书画事业的新局面作出新的贡献。

与会人士表示,现代农民画的不少作品想象力丰富,创作手法大胆。而当下轻视农民创作、认为农民不懂艺术的思想观念仍有一定残留,这需要通过展示农民书画艺术来转变这样的观念。农民画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创新,是众多农民画家和研究者共同关注、思考的问题。

(黎 华)

■短 评

真正的“现实主义”写作

我对当前小说创作,尤其是那些打着现实主义旗号的小说创作的一个意见是:作家们越来越脱离活的社会关系,脱离活泼泼的现实而写作,因而,他们笔下的“现实”不是活的现实,他们笔下的“人”也不是活的人,他们文中之情感与思想,自然也不是活的情感与思想。

在活生生的现实面前,在充满戏剧性的现实面前,这样的小说是那么的苍白,那么的乏味。

这也是为什么我比较喜欢杨小凡小说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不是从想象出发,不是从意愿出发,不是从虚构出发介入生活,相反,他是从生活出发,从现实出发,从内心出发,向着小说可能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戏剧性和形象性进军。这不仅使他的小说闪烁着生活的光泽,而且也闪烁着艺术的光泽,也就是说,这使他的小说呈现给读者的是“活的社会关系”和“活的人”,是“人们”在“活的社会关系”中上演的“活的戏剧”。近几年来杨小凡发表的十几篇中篇小说《工头儿》《望花台》《欢乐》《家燕》《牡丹花》等无不打着他对“活的社会关系”和“活的人”的深刻观察之印记,也显示着这是一条虽然艰难但却充满希望的写作之路,而其中篇新作《喜洋洋》则进一步确认了我的这一判断——在这篇小说中,杨小凡将其对社会关系和人的观察与书写又提升了一步。

这篇小说给我们讲述的,仍然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故事:赵大嘴原本是白家屯的孤儿(父亲死了,母亲走了),是吃百家饭长大的,19岁时,由于一时冲动,与恩人白香亭丧夫的儿媳婆子有了意外的情感,事情暴露后,感觉无颜见父老的他远走他乡。多年以后,经过艰苦打拼,赵大嘴在城里做药材生意发了财,成了大老板。这时,他又常常想起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来,想回家去做点儿“善事”,以弥补自己内

心的亏欠。经过一番铺垫,他终于回到家乡,出资建了一所名为“喜洋洋”的敬老院,并扶持村民建起了“中药材种植合作社”。没想到,这却给他带来了无尽的麻烦:不仅乡村干部讹诈他,让他多投资;不但种植中药材的乡亲讹诈他,要他多付钱;就是那些他义务赡养的老人竟然也讹诈他,不仅要他改善硬件设施,还要他改善软件设施,有的甚至要他提供“色情”服务。最后,他竟因此而被拘捕……

这个看似“匪夷所思”的故事,却是今日中国乡村普遍上演着的戏剧,是铁一般的“真实”。对这个“真实”的发现和书写,是这篇小说的最大价值之所在——现在写底层、写农村的作品铺天盖地,但由于作者对底层、对农村的隔膜,所以,大多数作品的视角仍然比较老套。要么是道德关怀式的——在这样的视角中,农民是那么的淳朴,那么的善良,也是那么的柔弱,那么的无能。要么是启蒙批判式的——在这样的视角中,农民是那么的愚昧,那么的迟钝,也是那么的可怜,那么的“可爱”。即使最与时俱进的,也不过是重弹“三农问题”的老调——在这样的视角中,农民是那么的苦,农村是那么的穷,农业是那么的危险,因而也是那么的没有希望,没有出路,没有活力。

因为这些作者们忘记了,他们所写的是几百年前、几十年前,最迟也是十几年前的农村和农民了。他们呈现的要么是“小农经济”和“道义经济”中的农村和农民,要么是“公社体制”和“官僚体制”(包括崩溃过程)中的农村和农民。可他们却对我们说:看啊,这就是我们眼下的农村,是“现实”的农村,他们是多么的“可怜”啊。当然,还有另一种哀叹声,那就是:他们是多么的“可爱”啊。实际上,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今日的农村早非昔日的农村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自

1990年代以来,在商品经济先是和风细雨后是暴风骤雨式的浸润与冲击下,在当下的乡村,不仅计划经济时代的互助合作思想早已烟消云散,就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扎根了几千年的“道义经济”也基本上成了“残余中的残余”。它们都无力结构农村社会,因而早已不是农村社会中主流的社会关系了。客观地说,在现在的中国农村,至少是大部分农村地区,主导性的社会关系是市场经济的社会关系,是适者生存的社会关系,用一句更直白的话说,就是一切向钱看的社会关系。一些“边地”开发的旅游区、一些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城乡结合地带浓缩着当今乡村社会关系的魂魄。这魂魄就体现在当地一些“生意人”的粗暴与贪婪上,而仅仅十几年前或者几年前,这些“生意人”还是淳朴得几乎不知钱为何物的“农民”。

这就是小说主人公赵大嘴黑色幽默般遭遇的现实背景:由于背井离乡多年,也由于对家乡的朴素情感,尽管在市场经济的汪洋中挣扎了多年,拼搏了多年,吃尽了其中的酸甜苦辣,经验丰富的赵大嘴仍然以为家乡还是那个道义之风盛行的家乡——对许多漂泊在外的人来说,家乡大概永远是最后一块“理想”的土地吧。但他错了,理想的家早已风流云散!在他的视野中,这是第一次有人如此呈现乡村,也是第一次有人呈现如此的乡村。可以说,这个呈现就是发现。

说一句并非多余的话,作者绝非将其批判矛头指向农民这个群体——对任何合格的作家来说,这都是不合格的举动,不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而是指向农民所身处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作者是从社会关系的变动出发考察农村的变迁并进而考察人心的变迁的。这样的小说,不仅深刻,而且生动——这才是真正现实主义的小说。

■关 注

对不确定性的呈现并非小说的专利,事实上,这是一切虚构性文学作品——小说、诗歌以及戏剧——的旨趣和魅力所在。不确定性规避了那种总是试图以一种凝固的看法来代替探询和叩问的危险倾向,不确定性也消解了探询和叩问之后那惟一答案的出现——它只是衍生出更多分岔的小径,导向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发现和疑问。新闻报道总是试图努力接近那个惟一的事件真相;哲学家热衷于给世界描绘出一幅固定图景;有少数散文沦为作者自我标榜与粉饰、运载大众化观念和集体性话语的工具。而真正的文学作品总是在顽强地抵抗着惟一性和确定性的统治,绝不愿意被某种凝固的观念所束缚。文学之摇曳多姿、异彩纷呈即源自于此,文学最迷人的气息即散发于此,文学之永远不会被新闻报道和“知音体”文章所取代也是种因于此。

文学所要呈现的不确定性似乎有三种(我只能使用似乎这个词,因为这也是不确定的):自我的不确定性;世界的不确定性(包括作为他者的人);自我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至今为止,我尚未创作过戏剧,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我无权谈论这种与小说堪称近邻的艺术形式,但出于慎重,对于它如何呈现不确定性,我还是在此略过。我只愿根据自身的创作体验,不那么确定地指出:诗歌倾向于以不确定性来呈现不确定性——词语的不确定性、情绪的不确定性、意象和意境的不确定性,而小说则更倾向于以确定性来呈现不确定性——语言的精确、细节的精确、形象塑造和结构建立方面的精确。所以做一个纯粹的诗人是相当愉快的,这种愉快的本因就在于诗歌特质与不确定性的天然趋近关系。当灵感降临,诗人们无须过多思索,只需顺应节奏放声歌唱或低声吟咏,就能吐出滕胧多义的美妙诗句。而小说家则相对痛苦,因为他无可避免地会陷入到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长久搏斗之中。他要准确,同时又要模糊。假如有哪位画家以清晰的线条勾勒出宇宙混沌面目,那么,真正的小说家们在这幅杰作面前都会热泪盈眶——这就是他们毕生所追求的境界!

有的小说家偏爱短篇创作,不管他有无自觉意识,他从中所获得的快乐,都远远超过中、长篇创作。撇开三者创作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的差异不谈,短篇小说的特质与不确定性的关系,显然要密切一些。好的短篇当然也需要确切、清晰的描写,但它无须呈现一个完整的事件,或者说,它可以把这个事件掐头去尾,把来龙去脉隐藏在精细的场景描写中。更多时候,它只是为了抓拍一个瞬间,呈现一个微妙的细节。这个场景、瞬间或是细节,都充满变数。它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微小的改变却能导致人物和事件的不同走向。短篇小说家往往就是通过对一个点的精确描绘来呈现不确定性的无处不在和惊人能量。尽管需要小心翼翼如同行走在钢丝之上,但在这种直抵核心的描绘中他很快就获得了至深的快乐。当然,他也要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搏斗,但这种搏斗不久就结束了。而与此同时,那些中、长篇小说的创作者们,也许才刚刚揭开事件或人物命运发展的序幕。此时,兴奋感和激情多半退潮,他们面色凝重,深吸一口气以平伏心中的忐忑不安,准备应对漫长而剧烈的消耗战。

中篇小说大多需要呈现一个相对完整的事件,而长篇小说要展现更广阔的人物命运史。这意味着会有一个结局,而结局往往是确定和凝固的(短篇小说有结尾,但结尾不等同于结局)。小说家常爱在开头与结局之间的关系上绞尽脑汁,这种关系往往是逆反的。也就是说,仅仅通过开头去推论结局,大部分读者都会得出一个与小说结局相反的推论。即使使背逆反关系,那结局与开头的关系也是拧着走的。就像图尼埃在长篇小说《礼拜五》的结尾,让鲁滨孙留在蛮荒的孤岛上,却让野蛮人礼拜五跟随着“白鸟号”走向所谓的文明世界。而最能展现不确定性的,莫过于那个从“白鸟号”溜下海去和鲁滨孙一起留在孤岛上的小孩,他被鲁滨孙怀着意外和愉快的心情命名为礼拜四。这是多么熠熠生辉的一笔,让人充分感受到了不确定性的迷人魅力。

小说家还会在开头向结局推进的过程中设置一些岔路口,这些岔路口是由人物性格、环境或这个世界上一些更让人难以把握的因素所造成。有着丰富阅读经验的读者尽管可以在读到一小半后就推测知了结局,但他总会在心里慨叹:结局不应该是这样的,它至少还存着另一种可能性。敢于冒险的小说家总会把结局设置在小说的开端。在这方面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在这部中篇小说的开头,马尔克斯出示了一个确定的结局:“圣地亚哥·纳赛尔在被杀的那天,清晨五点半就起床了,因为主教将乘船到来,他要前去迎接。”后面所有的描写都在呈现他为何被杀。而读者阅读这个过程时最大的感受就是:圣地亚哥·纳赛尔有太多的可能性不会被杀掉。他们很清楚地看到,只要稍稍挪动一个小小的路标或设置一个轻巧的路障,就能彻底改变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命运,以至于他们恨不得立刻跳进小说中去做这件并不需要费多大力气却能改写悲剧的喜事。过程远比结局要精彩,不确定性远比确定性要魅惑,优秀的小说家总是尽量展现那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甚至尽量延缓确定结局的到来。在那篇冷硬又苍凉的《没有人生给他写信的上校》中,马尔克斯让上校用大半生的时间等待退职金的到来。而直到小说结尾,马尔克斯也没有提供一个明晰的答案。比马尔克斯早生了25年的沈从文在《边城》中同样不愿意给出一个确切的结局,他说:“这个人也许永远不会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他把翠翠悬置于一个等待的状态中,让读者永远怀着惆怅和伤感的情绪去揣测。比沈从文大11岁的卡夫卡做得更极端,他干脆不把《城堡》写完。那些试图在卡夫卡遗稿中挖掘出一些片段以补正《城堡》的编辑们注定是徒劳的,因为《城堡》是一本最纯粹的确定之书。城堡(象征着世界)是不确定的,土地测量员K(象征着自我)是不确定的,K与城堡的关系(象征着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尽管细描细写精细,但事件和人物命运始终是在含混不清的状态下展开的。它实在不需要一个结局,或者说,在任何地方停笔,都可以算做结局。卡夫卡不需要展示终点,所以他把岔路口作为终点。这决非敷衍塞责,而是来自小说家对世界变动不居的本质的深刻领悟。

的确,没有谁比小说家更能全面深入地感悟不确定性那混合着残酷和快乐的魅力,甚至诗人也不能与之相比,因为诗人大多只享用了它令人愉快的那一面。不确定性意味着多变、存疑甚至自相矛盾,意味着作品有生动的气韵和混沌的面貌,好的小说都或多或少地呈现了这些性质——这是我惟一能够确定的地方。

□马笑泉

小说与不确定性

《终极大冒险》举行“快乐冒险”长跑活动

本报讯 3月23日,动画电影《终极大冒险》剧组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举行了“快乐冒险”主题长跑活动,同时对影片进行了介绍。

《终极大冒险》由北京电影学院、湖南金鹰卡通有限公司以及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出品,目前已完成了后期的剪辑工作,将在今年7月暑期档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个每天生活在“办公室战争”中的都市青年,通过一次关乎生死存亡的挑战而最终找到生活的真正意义以及完美恋情的故事。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孙立军表示,举办这次主题长跑活动就是为了推广影片中所宣扬的“快乐冒险”精神,鼓励青年人敢于坚持生活中的梦想。(黄尚恩)

黄继胜同志逝世

黑龙江省伊春市西林区国税局局长黄继胜同志,因病于2013年3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55岁。

黄继胜,笔名再生。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200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走笔大西南》《浅秋绿色》,报告文学《铁流交响曲》《无悔的选择》等。